

中国境内出土萨珊波斯风格印章考略

吴佳玮

内容提要：萨珊波斯帝国和古代中国虽非近邻，但经由丝绸之路的传播，在贸易文化上多有来往，尤其自20世纪以来在新疆和中原地区陆续有萨珊波斯风格印章的出土记录，证明了两者的密切联系。本文就已知可查的资料，列举中国境内20世纪初至今出土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试考证其出土信息、材料形制、纹饰题材等信息，并进一步就这些印章的工艺风格、产地来源、功能和流入机制等方面略作探讨，进而管窥六朝至唐代丝绸之路上文化和艺术风尚的传播。

关键词：萨珊波斯 印章 丝绸之路 图像传播

萨珊波斯帝国和萨珊风格印章

萨珊波斯帝国（224—651）立国逾四百年，即相当于魏文帝黄初五年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当其极盛时是横亘中、西亚的庞大帝国，东界曾一度扩张至今新疆喀什噶尔^[1]，在文化、宗教和艺术等领域对中国亦曾有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萨珊波斯帝国之用印以四类形制为主，即宝石镶嵌印、金属雕刻戒指印、整体雕刻平面印和尺寸较大的板形印。其中，宝石镶嵌印和金属雕刻戒指印是希腊化时代欧洲和中、西亚共同流行之印章形制，而前者中大部分也以戒指为载体。整体雕刻平面印外形较为多变，包括半球形、半椭球形、半磨盘形^[2]、锥形、环形^[3]等，但以半球形和半椭球形为多见。尺寸较大^[4]的板形印一般在—侧平面或弧面雕刻较为细腻复杂的纹饰和大量的铭文，已知存世的实例均为萨珊波斯的国王、藩王、王室成员、宫廷官员和高级武将等所有，推测其使用方法是—以贵金属装置成带柄的平面印，或也可能镶嵌在头冠上^[5]，以便钤印或供他人辨识；但—官方报道中迄今未见此类贵金属装置存世，唯据封

[1] 此处据沙普尔一世在纳克西·鲁斯塔姆的“琐罗亚斯德的卡巴（Ka'ba-ye Zartosht）”留下的铭文（SKZ），第三行（原文作Kaš），译文参考Huyse 1999。

[2] 即磨盘形（或药片形）的珠子径向切掉一部分后，在切面上雕刻印纹。

[3] 可以理解为半椭球形的一种特例，即孔距较小且孔道直径占珠体横截面直径比例较大（通常大于四分之三），因此其外观如一枚整体雕刻的戒指。然此类印章多数孔道直径作为戒指仍嫌太小，推测其使用方法是串系在手镯、手钏、项链等首饰上。

[4] 和同为平板形的宝石镶嵌印相比，这类印章的尺寸明显较大，通常大于3cm，并不适合镶嵌在戒指上。

[5] 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亚兹丹·弗丽·沙普尔（Yazdān-Frīy-Sābuhr）的平板形印（高4.4cm），据说原来镶嵌在—件金头冠（不幸已被熔作他用）上，但该头冠是否为萨珊时期的原制亦未可知。

泥上的印蜕可以推测其存在^[1]。萨珊印章既有文字印，亦有图像印及两者的结合。存世数量最多的私人用印则以图像印和文字图像印结合为主，图像题材则极为丰富，包括人物、动植物、异兽神祇、神话场景以及象征符号等。

本文标题中的“萨珊风格印章”乃指采用萨珊波斯帝国典型形制的印章，且其纹饰题材和风格均有可参照的官方出版的萨珊印或印蜕实例。其中一些印章上也可观察到非萨珊波斯“典型”的风格或题材元素，对其渊源文中亦会有所考证。必须说明的是，作为“典型”的“参考样本库”是已出版的各大博物馆、考古发掘遗址和私人收藏中的萨珊波斯印章，但这将导致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在已出版的萨珊印章中，有完整考古出土记录的样品比例相对颇低，且已发掘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遗址非常有限，因此该“参考样本库”中印章风格和题材的“典型性”更多建立于图像学和类型学之上，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支持。以该“参考样本库”判断某件印章的风格或题材是否“典型”仍需持谨慎的态度。然而以现下情势也只能依赖这个不太完善的“参考样本库”，期待伊朗及其周边国家未来的考古发掘能促进完善对萨珊波斯印章的认识。

所用资料说明

萨珊波斯风格印章的流行区域非常广泛，除萨珊波斯帝国中心的伊朗、两河流域等地外，在中亚、南亚的巴基斯坦甚至中国境内均有出土记录。本文考察20世纪初至今中国境内出土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所依据的资料大致分为两类：20世纪初至今国内出版的考古报告中萨珊印的记录，以及20世纪初经由盗掘或文物走私等途径由新疆地区流至国外的萨珊风格印章。其中，流出国境的部分至今能公开查询到的只有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记录，以及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所撰写的数份新疆考察报告中提到的由他发掘或采集的萨珊风格印章，并且后者可以确认为包含于前者之中。

鉴于此，下文对藏品的具体考证也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为国内出版的考古报告中所及萨珊波斯风格印章；尔后则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中国新疆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在讨论后者时也将同时参考相关的第一手考察报告资料以追溯来源；然而其中一批藏品为当时著名的东方学家霍恩累（Rudolf Hoernle, 1841—1918）的旧藏，并已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但无法进一步追溯其来源信息。^[2]

国内考古报告中的萨珊风格印章

20世纪初至今，国内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可见萨珊波斯风格印章凡十一件，其中两件出自新疆，

[1] 参看Gyselen 2007，第26页；同时，书中所列多件带有将军（spahbed）和国库大臣（ganj）印蜕的封泥都可看到镶嵌留下的痕迹。

[2] 据大英图书馆档案记录（British Library Archive/Register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1887—1921），霍恩累于1895—1901年之间所获来自中亚的手稿、钱币等藏品中含印章77件，提供者有哥德弗雷（Stuart Hill Godfrey, 1861—1941）、马卡特尼（Sir George Macartney, 1867—1945）和塔尔伯特（Sir Adelbert Cecil Talbot, 1845—1920）等。这批藏品于1902年6月从印度转移到英国，其中的印章部分最终全部流入大英博物馆，本文所讨论的霍恩累收藏即来自这批印章。根据大英在线数据库的记录，其中有两件萨珊风格印章为斯坦因所获，其他的则已无法进一步追溯。参看Sims-Williams 2009，第1—2页。

两件出自宁夏固原，其他均出自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出土遗址的年代自北朝至盛唐时期，其中两件年代无法确定。以下按所属墓葬或遗址年代依序考之。

北魏吕达墓

这批萨珊波斯风格印章中，出土遗址年代最早者是1987年发现于河南洛阳市吉利区的吕达墓^[1]。墓中出土一金戒指，镶蓝色宝石印章（图1.i），印章及周边包镶的金托略凸起于戒圈，外缘饰一圈联珠纹。戒指整体直径21毫米，高22毫米，重9.3克，印面雕刻一举起双手的人物面向一侧行走。吕达的墓志说明其为威远将军、积射将军和宫舆令，纪年为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已接近北魏末期。

吕达墓所出印章上人物头部和举起的双手的雕刻手法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件萨珊波斯印章（图3）非常接近，后者一般认为是表现《圣经》中圣徒但以理在狮穴中之“圣迹”。然而吕达墓所出印章上没有其他元素，也未描绘衣着特征（或为裸体），故难以揣测其身份。人物正面举起双手的姿态多见于萨珊波斯和拜占庭印章中与天主教相关的题材，以表现圣徒或耶稣布道。但此处人物体态呈侧向行走状，亦有可能是表现胡人舞蹈的题材。

类似吕达墓所出宝石镶嵌印章的材质在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帝国和中亚都有发现，一般认为是以蓝白缟玛瑙切割而成的，故上下两层呈现不同颜色，经俏工雕刻后纹饰图案与底色呈现反



图1



图2

[1] 参看《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第48页，图版拾叁。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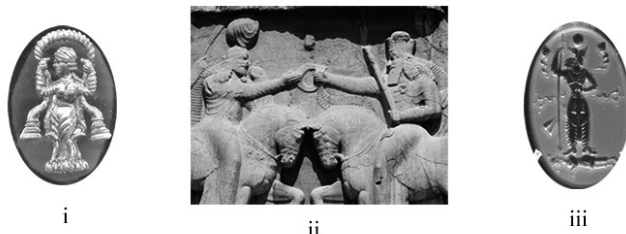


图4

差，从而更为醒目。欧美微雕宝石研究传统上将加工后呈现蓝白双层色差的宝石戒面称为“尼柯罗（nicolo）”^[1]，其材质通常为玛瑙^[2]，但亦有以玻璃仿制者，另则蓝白两色是否天然生成抑或经过人为加工改色尚无定论。

北周李贤墓

李贤（502—569）为北周大都督，封河西郡公，“开府仪同三司”；又因曾抚养宇文邕兄弟，死后加封柱国大将军。其夫妇合葬墓1983年出土于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墓中陪葬一枚镶蓝色宝石金戒指（图1.ii），属于其妻吴辉，戒圈式样与吕达墓相似，但无联珠纹装饰，所镶印章的顶面也与戒圈平齐；戒指最大外径24毫米，内径17.5毫米，重10克，宝石直径8毫米。印章上雕刻“一个裸体女性形象，身体的四分之三朝向右侧，双手握住一个长条形围巾上举，在其上方形成拱形，围巾的两端各垂一个囊状物”^[3]。

这件宝石镶嵌印章的题材无疑源自萨珊波斯艺术中流行的“站立的女人和拱门”主题，但萨珊波斯印章上站立女子一般衣着华丽，较少见裸体形象，倒是新疆所出另一件类似题材的宝石雕刻印章上明确描绘裸体女子（参看下文）。萨珊波斯印章上常见的拱门由两根柱子和一条弧拱组成，对比可知此处描绘当非拱门，而是由女子手持一条较长的织物甩过头顶——此版本略少见，而大英博物馆所藏一件镶嵌宝石印章（图4.i）上有类似描绘；由后者可见女性手中垂下者当为织物的两端，且可能特地重叠扎起以更显华丽。值得注意的是，大英所藏印章上织物两端的描绘手法和很多其他萨珊波斯艺术品上的绶带非常相近，如著名的伊朗纳克西·鲁斯塔姆（Naqsh-e Rostam）阿达希尔一世^[4]摩崖石刻上两位骑者手中传递的绶带环（图4.ii）、大英博物馆所藏巴赫兰四世^[5]镶嵌宝石印

[1] 该词源自onicolo，意大利语意为“小缟玛瑙”，参看King 1866，第11页。普林尼《自然历史》一书中提到的aegyptilliam可能指的就是这类宝石。

[2] 同时参看下文“北齐徐显秀墓”和“唐史诃耽墓”的考证。

[3] 参看《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后文简作《异宝西来》），第173—174页。

[4] 阿达希尔一世（224—241年在位）是萨珊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

[5] 巴赫兰四世（388—399年在位）是萨珊波斯帝国的第十三任皇帝。

章（图4.iii）上人物周身所扎数组绶带；历代萨珊波斯国王所颁发的钱币上，国王头像和火坛也往往扎有类似的绶带。手持绶带的女性形象也可见于中亚艺术，如一件嚧哒时期的银盘^[1]。一些学者将绶带（中波斯语作dastār）和胜利以及“荣光”（阿维斯塔语中的xvarənah，粟特语作farr，中古波斯语作xwarrah）^[2]联系起来^[3]，进一步也可以象征神赐予的幸运、繁荣、成功等^[4]。李贤墓所出印章上女子作侧身行走或舞蹈状，和吕达墓以及徐显秀墓（见下文）印章上的人物相似，而和萨珊印章上常见的静态站姿有别。

关于站立女子形象的象征意义，有不少推测。A. H. Bivar在编撰大英博物馆所藏萨珊波斯印章图录^[5]时，曾将所有全身立像的女性都视为拜火教中的江河女神阿纳希塔^[6]。Gnoli此后根据一件印章上的铭文推断此类站立女性形象可能是拜火教中“良知神（阿维斯塔语作Daena，中古波斯语作Den）”^[7]的化身^[8]，但Gnoli考证的印章上没有拱门或绶带，故这一认定或不能普遍适用。李贤自称李陵之后，为鲜卑后裔或鲜卑化的汉人，妻子吴辉“其先自渤海徙焉”，两人未必信仰拜火教。然李贤久居河西，多与胡人交往，或对绶带（dastār）的一般象征意义，即幸运、繁荣等有所了解乃至沿用，亦可能效仿西域贵族以其象征身份高贵（同时参看下文徐显秀墓所出镶嵌宝石印章的讨论）。

此印的材质外观和吕达墓所出极其相似，但亦无科学检测结果，此处不再详述。

北齐徐显秀墓

北齐武安王徐显秀（502—571）的夫妻合葬墓于2000年发现于山西太原迎泽区郝庄镇王家峰村。墓中出土一镶嵌蓝色宝石的金戒指（图1.iii），重23.413克，最大外径28.9毫米。按张庆捷和常一民先生描述：“戒指环在靠近戒托的两端各铸有三分之一的纹饰，纹饰为一种似龙非龙、似狮非狮的怪兽首。从指环侧面看，该兽首有两尖耳，紧贴向后，双目圆睁，口张露齿，颈部似鳞甲，又似卷成一团的鬃毛，整体造型及神情颇为凶猛。两兽鼻口与戒托相接，前粗后细，前有纹饰，后为素面。”^[9]镶嵌印章的金托外缘亦装饰一圈珠径较大的联珠纹。戒面阴刻人物图案，“人物头戴一顶很大的近似狮头的兽首形头盔，脸庞较窄，深目高鼻，似为短发。上身穿紧身圆领半袖衫，下身

[1] Marshak 1986，图11—13。

[2] 关于“荣光”（xvarənah）一词的词源考证，以及在不同的伊朗语系和非伊朗语系中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参看Gnoli 1999和Soudavar 2016。

[3] 参看Grenet 2010，第92页和Soudavar 2016。

[4] 然而该问题亦存在一些争议，如Shenkar 2013。

[5] 参看Bivar 1969，第35页。

[6] 全名Aredvi Sura Anahita，拜火教中掌管水的女神，同时也被视为丰产、医疗和智慧的女神。

[7] 阿维斯塔语作Daena，代表宗教意义上的“领悟”和“启示”，因此可以理解为“良知”，或“信仰”本身。在拜火教信仰中，Den在特定场合会化身为一位女性，如行善者的灵魂踏上连接人世和“冥界”的钦瓦特桥（Chinvat Puhr）时，他的Den就会变作一位十五岁少女前来迎接。

[8] 参看Gnoli 1993。他所考证的印章上站立女子手持一朵鲜花，头顶无拱门类构造，但大英博物馆所藏另一件印章（编号120216）上却有女子手持鲜花立于拱门下。

[9] 此处关于戒圈装饰的描述和下文关于戒面纹饰的描述均引述自《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第53—54页。

着紧身裤，脚蹬皮靴。两臂上弯，双手倒提着两件上有装饰的杖形器。右手所握杖形器较短，上为尖状，下为圆球形，近圆球形处并列有两排中间细两头粗、长度仅有主棒三分之一的横状物。左手所握杖形器较长，上为圆球形，下为尖状，在近尖形处分左右有两根倒立尖锥状物，使整个下端看起来像锚或箭链的形状。该人物为立像，膀宽腰细，身体略向左侧，头向右扭回。两腿一前一后，后腿提起，向前走而又回顾，似在舞蹈，又似在举行某种特殊的祭祀仪式。”

关于戒圈装饰的怪兽形象，在同时期中原的金器上极为少见，但在伊朗和欧亚草原的一些铜质和贵金属首饰上可以看到类似的装饰手法，如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一件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时期的金臂镯，其开口处的两端即装饰了类似的嵌绿松石兽头（图5.i）。这一形象或为西亚两河流域的史前艺术中一种“狮—格列芬（lion-griffin）”^[1]异兽的演绎。

至于蓝宝石印章上雕刻的人物形象，笔者以为其头部的描绘手法以及身体姿态和上述吕达墓、李贤墓所出印章如出一辙，因此所谓“兽首头盔”或有过度解读之嫌；甚至上述萨珊印上的但以理形象（图3）亦有类似的头部描绘，但这位基督教圣徒显然不可能佩戴什么兽首头盔。这里的人物造型可以对比一些贵霜或萨珊—贵霜风格的印章，如撒马尔罕的卡费尔·卡拉（Kāfer Qal'a）遗址的一件封泥印蜕（图5.ii）^[2]，以及Aman ur Rahman收藏的一些犍陀罗地区所出印蜕和印章（图5.iii—iv）。这些图纹中人物手臂的弯曲方式尤其相似，人物体态也更为瘦削灵动（参看后文讨论），而与典型的萨珊风格有所区别。

人物手中所持的一对权杖或武器存在各种解释，由此导致人物身份大有争议：一说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但赫拉克勒斯的常见艺术形象中少见持长矛者；另一说将其比至印度—斯基泰钱币上出现的宙斯形象（图5.v）；另外，粟特风神韦室（Weshparkar）亦有一手持三叉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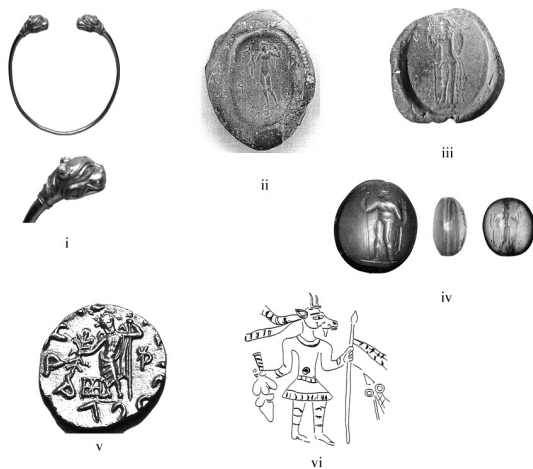


图5



图6

[1] 该形象一般为狮头、驴耳、有翼，躯干前半部为狮身而后半部为鹰身鹰尾，是两河流域神话中的一种恶魔，但在皇家艺术中也常用于象征王者或国家的武力。

[2] 卡费尔·卡拉封泥所在的要塞遗址据Cereti和Cazzoli的判断可晚到8世纪，但该印章图纹风格的年代显然远早于此。参看Compareti 2013，第138—139页；Abdullaev 2005，第28页。

一手持棍棒的形象^[1]；若将人物所持短杖形器视为树枝或葡萄枝，则亦可能和酒神崇拜有关^[2]。另外，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一件花刺子模银器上有一羊头人身的形象，一手持分叉的棍棒一手持长矛（图5.vi），其归属尚难确认但可能和印度教有关。^[3]总之，该形象无疑有着中亚的源头，但究竟是贵霜神祇还是印度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亦可能为两者早期结合的产物。

此件镶嵌宝石印章的材质经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首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用X-射线衍射仪和宝石显微镜观察鉴定，确定为碧玺。^[4]对于这一检测结果，笔者同样表示怀疑。这件宝石的外观和下文叙述的史河耽墓所出镶嵌宝石印章非常接近，同样也极似前文介绍过的尼柯罗（石英质晶体），何以三种材料各有不同？！关于印章材质另可详见文末的讨论。

东魏至北齐李希宗墓

李希宗（501—540）为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策士，女李祖娥为文宣帝高洋妻；其夫妻合葬墓于1976年出土于河北赞皇县南邢郭公社。墓中出一枚镶宝石金戒指（图1.iv），是李希宗妻子崔幼妃（576年下葬）陪葬，重11.75克，戒圈形制与吕达墓、李贤墓所出相似，镶嵌印章的金托凸起，外缘饰双层联珠纹。^[5]

关于所镶嵌的宝石印章纹饰，可见一走兽及背上分三茬的花朵或果实，原出土报告描述为“鹿”，当为误认。该兽低头行走，足部明显有爪而非蹄，无尾，嘴长，耳长，似熊或狼一类的猛兽，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件萨珊波斯印章（图6.i）上的狼纹与其相近。印面纹饰的整体构图接近中亚银器上的一类图像（如：图6.ii^[6]），而史河耽墓所出印章的纹饰也采用了几乎一样的构图（见下文）。近来的研究认为后者中分三茬的花朵或果实可能是石榴或罌粟^[7]，但观图6.ii等银器纹饰则其他植物也可能出现，故此处所描绘的也不一定是一种具象的植物，而可能是一类涉及猛兽和植物的流行艺术母题的抽象复述^[8]。李希宗之妻崔幼妃为汉人，当不奉拜火教^[9]，故此难以从信仰角度推测纹饰内涵；相反若将其看作流行艺术母题的一个副本，正如同时舶来中国的织锦、银器等其他工艺品一样，因其精巧和稀有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似乎更说得通。

原考古报告中将这枚镶嵌宝石印章的材质认作“轻晶石（青金石）”，但显然未做过检测，其外观和前述几件非常接近，当为同类材料。

[1] 韦室是粟特拜火教中掌管风的神祇，这一描绘手法显然融合了印度教中湿婆（Shiva Mahadeva）的形象，但较常见的版本为三头四臂。参看Grenet 2010，第92页。

[2] 另一手持物可能是酒神杖（thyrsus）。

[3] 参看Mode 1993，第185页，该文注释57中提到了一些类似的艺术品以及和Naigameya的关系。在印度教传说中，Naigameya是战神加西及夜（Kartikēya，又名塞犍陀，引入佛教后为韦陀天尊）的一个分身。

[4] 参看《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第15页。

[5] 参看《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第388页。

[6] Marshak认为该银器上所描绘的是虎，但其头部更像狼或鬣狗，亦不排除为工匠想象的产物。

[7] 参看《固原史河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第97页，以及后文的讨论。

[8] 然史河耽墓所出印章上的植物可能确有所指，见下文。

[9] 亦有学者认为她信佛，参看《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第45页。

内蒙古呼和浩特水磨沟口北朝墓

1959年夏天，在呼和浩特市以西，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东北的水磨沟口掘得人骨架一具，陪葬有拜占庭金币和两枚镶宝石金戒指，其中一件金戒指镶嵌有黑色宝石印章（图1.v）。该戒指的式样和李贤墓如出一辙。原报告中描述其宝石印章上刻有“人像，头蓄长发，上肢前伸，两腿一前一后，作行进状，背后似挑一物”^[1]。拜占庭金币为拜占庭皇帝列奥一世（Leo I, 457—474年在位）时所铸，相当于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初年时期。虽然钱币只能用来限定墓葬的最早年代，但现今学界也倾向该墓当为北朝时落葬^[2]。因无法确切断代，故将其排在所有北朝墓葬之后，隋朝墓葬之前。

该镶嵌宝石印章的图案和后文新疆巴楚所出当为同一题材，但雕刻风格略有不同。该题材在萨珊波斯印章上也非常常见（如大英博物馆藏品119375），所描绘的当是一位手持绶带环的裸体男性羽人，身材矮短可能意在表现孩童，而在某些萨珊波斯印章上也会异化为人首鸟身。关于该形象的象征意义，学界历来有争议。乐仲迪女士曾将该形象和地中海至中、南亚艺术中多种羽人和半人半鸟形象做过比对梳理，但并未提出最终的认定。^[3]亦有



图7

学者提出该羽人形象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奈基（Nike）在贵霜艺术中的变化。伊朗西南部比沙普尔（Bishapur）一处纪念萨珊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I）对罗马战争胜利的摩崖石刻上，于国王头顶亦描绘一位裸体有翼男孩，手持一条绶带似要为国王佩戴（图7）。这一形象显然源自古典艺术中的胜利女神或普托（Putto）。比沙普尔当时为罗马战俘的主要安置点之一，在其附近的公共雕塑上使用此图像程式显然也有政治宣传的目的^[4]。该摩崖石刻建成于3世纪中期，或可认为是印章上羽人图像的原型。此处的绶带（dastār）可象征胜利或“荣光”（xvarənah），而Soudavar则将持绶带裸体羽人认作拜火教中的阿帕姆·纳巴特（Apam Nabat）神^[5]。Xvarenah和dastār的概念主要流行

[1] 参看《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第182页。

[2] 参看《中国境内出土的西方金银器与金银币初探》，第8页，而原考古报告（注41）认为该墓葬年代为隋唐时代或稍早。

[3] 参看《萨珊印章上的希腊鸟身女仙》。

[4] 参看Miri 2017，第70—71页。

[5] 参看Soudavar 2016。阿帕姆·纳巴特即原始雅利安信仰中的伐楼那神（Varuna），但其地位有所下降，在《阿维斯塔》中他是凯扬（Kayian）“荣光”（xvarenah）的守护者和赠予者。

于伊朗语系的人群（波斯人、粟特人等）中，对周边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1]。若如原报告所言，墓主是一位行商，则有可能他是一位粟特人，或至少常与说伊朗语人群接触，因而可以理解这些图像的内涵。

此印的材质和吕达墓相似，此处亦不作进一步考证。

隋李静训墓

李静训是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敏之女，李贤的曾孙女，同时也是周皇太后杨丽华的外孙女，颇受其宠爱，于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早夭。1957年于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工地发现其墓葬，内有极为奢华的陪葬，其中一件嵌珍珠宝石项链的顶部金扣处镶嵌有一枚半球形蓝色宝石印章（图1.vi），印面刻有一头大角鹿。^[2]

近年来有多位学者讨论过项链的式样，通常认为是来自西方尤其是中亚，当无问题。此类珠饰元素组合较为繁复，且底端带有挂坠的项链在萨珊织锦和粟特织锦上皆可看到，多见于“衔绶鸟”^[3]纹样中。在一件萨珊波斯银盘上，国王巴赫兰四世也佩戴有类似式样的项链。^[4]本文主要关注印章，限于篇幅，不对项链的式样作更深一步的讨论。

李静训墓所出项链上的这枚印章是中原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整体雕刻的平面印。据笔者近距离观察，印身有浅浅的条带结构，其材料很可能是缠丝玛瑙或缟玛瑙。但迄今未见相关科学检测报告。



图8

印面的“大角鹿”纹饰在萨珊波斯印章中非常常见，相似的例子诸如牛津阿什莫良博物馆所藏两件鹿纹萨珊印章（图8）等。一些研究报告将其称为“驯鹿”^[5]，但驯鹿常见于北极圈附近，一般不见于伊朗。笔者认为这里描绘的更可能是至今仍广泛分布于伊朗高原和中亚地区的里海马鹿（学名*Cervus elaphus maral*，又称里海赤鹿、马拉赤鹿等），仅雄性有角，一般分为6叉，最多8个叉。当然在描述时使用较为通用的“大角鹿”或“雄鹿”亦无不可。鹿个性警觉，行动敏捷，同时也是重要的猎获对象，作为艺术图像有着丰富的象征含义。我国辽金时期的“秋山”题材玉器上即常用鹿的形象，展现北国情调，同时寓意丰收、富庶。作为皇家用度之物，这枚鹿纹印章或许也有相似的内涵。

[1] 参见（上文已引）Gnoli 1999。

[2] 出土信息参看《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第471页，项链形制和结构参看《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钏的产地问题》第77页，关于“大角鹿”参看下文。

[3] “衔绶鸟”实际为萨珊织锦上常见的一类口衔珠饰的鸟纹样，有时也表现为颈系珠串，珠串上有时悬有绶带；该纹样为粟特织锦吸收后演化出对鸟共衔珠饰的纹样，后亦影响了吐蕃织锦。类似的鸟纹在克孜尔壁画以及入华粟特人的石棺床浮雕上也可找到。

[4]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编号 1994.402，参看其在线数据库。

[5] 如上引《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钏的产地问题》。

唐史诃耽墓

史诃耽（584—669）是粟特史国人后裔，隋时曾为“平凉奴贼”，后降唐，盛唐时任中书省翻书译语直官。^[1]其墓葬于1986年发现于固原南郊，其中陪葬一枚镶嵌蓝宝石印章（无金托，图1.vii），“直径1.6、厚0.5厘米。一面光洁，边凸起。另一面刻有纹饰，中间为一卧狮。其面部清晰，鬃毛直竖，狮子背部有三杈结果实的短枝，周围有一圈字母”^[2]。

印面周边的文字无疑是萨珊波斯帝国流行的帕列维文，伊朗德黑兰大学的Rezaaibaghbidi、M.B.Vosooghi和Amuzegar三位教授将其释读为三个重复的中古波斯语词“ahlawdād”，意思是“虔诚的、敬神的、可嘉的、尽责的”^[3]，林梅村先生释读为“自由、繁荣、幸福”^[4]，而P. O. Skjaervø则将其解读为“慷慨、慷慨、慷慨”^[5]。该印章的铭文为草书，且书写颇为潦草，释读中颇多歧义，因而这三种解读孰为更优迄今尚无结论^[6]，但这对于理解印章纹饰内涵的影响是次要的。

郭物先生对该印章的纹饰元素及内涵有深入的解读。^[7]他认为狮子背后的植物可能为石榴或罌粟，前文讨论李宗希墓所出镶嵌宝石金戒指时亦有提及；而狮子则可能象征拜火教中的江河女神阿纳希塔、粟特地区信仰的娜娜女神^[8]，或者拜火教中司掌财富、幸运和生育的阿什女神^[9]。通过分析史诃耽家族的信仰渊源，他提出该印章中的狮子象征阿什女神的推测。笔者以为，以目前的资料和分析考证，此说有一定道理。前文已提到，动物背后出现分三茬花果的图像在萨珊波斯印章和中亚银器上都很常见，但史墓印章上所绘酷似石榴或罌粟，故也可能有特指。史诃耽历经隋末唐初数次政权斗争^[10]，得以跻身唐朝中央官僚系统，并享善终，对阿什女神的信仰确有可能是他重要的精神寄托。

该件印章的材质由地质矿产部陕西省中心实验室检测，认为戒面主体为石英单晶体，表面却为非晶态物质^[11]，可能为颜料涂抹上去。但其外观和上述吕达墓等所出一致，很可能为同种材料（参看后文讨论）。

[1] 参看《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

[2] 参看《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第96页。

[3] 参看《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第96页。

[4] 参看《异宝西来》，第197页。

[5] 参看《异宝西来》，第197页。

[6] 笔者或就该铭文的解读另撰一作。

[7] 参看《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

[8] 参看《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第98—99页。娜娜（Nana）女神掌管生育、丧葬、战争等，其信仰发源自两河流域，主要流行于中亚地区，尤其是粟特人中。其艺术形象和阿纳希塔颇多相似之处，但在6世纪后的粟特艺术中，受印度文化影响多表现为四臂骑狮女神。

[9] 波斯语作Ash，在贵霜和贵霜—萨珊钱币上称Adohsho，后者多借鉴希腊幸运女神提喀（Tiche）的形象，但在拜火教艺术中却以狮子和石榴为象征物。

[10] 参看《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

[11] 参看《异宝西来》，第199页。

河南偃师杏园盛唐墓

1983至1992年，于河南偃师杏园村以南发掘清理了一批汉唐时墓葬，其中于YD1902号盛唐时期墓中发现一枚镶“椭圆形紫色水晶”金戒指（图1.viii），“环体厚重，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最大外径2.2厘米，重6.5克”^[1]。

该戒指的戒圈式样和前述几件均有不同，托起镶嵌宝石印章的部分无联珠纹装饰，戒圈宽度不大但较厚。镶嵌宝石印章的外形也比较特别，呈一头尖一头较宽的水滴形，该形状在萨珊波斯帝国晚期至伊斯兰早期的镶嵌宝石印章中偶有见到。该宝石的材质出土报告中描述为“紫色水晶”，但照片上所见亦有可能是石榴石，两类材料在中亚地区都曾有使用^[2]，但石榴石明显更为常见（同时参看下文）。

印面所刻帕列维文铭文经日本伊斯兰史专家森本公诚先生（东大寺教学执事）释读为中古波斯语abd，意思是“好极了！”“奇妙无比！”等。^[3]铭文的书体为波斯帕列维文的过渡体^[4]，但使用了较为特别的双阴线勾勒手法，类似的纯铭文萨珊波斯印章几乎均为长椭圆形或异形的宝石镶嵌印，多见于萨珊波斯帝国晚期至伊斯兰早期^[5]，且“萨珊王朝的波斯银币上捶印有这种铭文，其年代最早者是相当于库思老二世（591—628）在位第1年的公元601年的货币，其后则经常出现”。故此可见这件宝石雕刻印章的大概生产年份与墓葬的年份（盛唐时期）相去不远。

巴楚脱库孜萨来

1959年在新疆巴楚的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一枚白色玉髓质半椭球形印章（图1.ix），高22毫米，长25毫米，宽15毫米。印的正面雕刻有“侧面向右呈行进状的带翼男子形象，两个胳膊外张，握有一个带有三角形缎带的圆形王冠。男子看上去裸体，腹部隆起。环绕头部一道斜线可能代表了头发（或是一顶头盔）”^[6]。印的背部刻画有装饰性的线条纹路。

该印章为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半椭球形印。脱库孜萨来为古城遗址，包括古城、烽燧、佛寺和墓地等，故此件印章有可能为实用具而非陪葬。印面描绘的羽人形象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水磨沟口北朝墓所出嵌宝石金戒指上的人物当为同一题材，其细节和内涵不再重复考证。巴楚所出这件印章的雕刻风格线条奔放，刀工泼辣，和史河耽墓所出嵌宝石金戒指上的狮子更为接近，而与上述水磨沟口所出殊为不同（关于风格参看下文讨论）。

[1] 参看《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第6页。

[2]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均出土过紫水晶质宝石镶嵌印章和珠饰等，新疆也有紫水晶珠子出土，如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880.3555、1956.0402.1.12、1902.1220.556等，参看在线数据库，至于石榴石则可参看下文。

[3] 参看《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附录二。

[4] 即由帕列维文“正书”逐渐过渡到“草书”的一种中间形态，一些字母出现连写组合，但大部分书写较为规范，易于辨认。

[5] 类似的例子可参看Gyselen 2007，第95页00.13。在萨珊波斯晚期至伊斯兰早期的封泥上偶尔可见此类双线勾勒铭文的印蜕；而对应印章则多为红玉髓、石榴石或紫水晶质的凸面椭圆形或异形宝石镶嵌印，流行年代也相一致。参看Bivar 1969，第23—24页。

[6] 参看《异宝西来》，第133页。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20世纪早期,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先生曾在新疆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发掘工作,并著有《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等一批著作,其中亦涉及一批采集自新疆的印章。但唯《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一件可确定为萨珊波斯风格(图版壹壹.49,图1.x),却被归在“发饰”一类。这是一枚半椭球形印章,印面刻一小鸟,低头、翘尾作啄食状,颇为生动。类似的纹饰可见于大英博物馆藏品(图9)。惜乎该印章的出土地、材质均不可考。



图9

流至海外的萨珊风格印章

如前文所述,这部分主要考虑大英博物馆所藏出自新疆和田地区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其中一部分来自霍恩累的旧藏,一部分为斯坦因历次在新疆所获^[1]。这批印章的材质和外形参考大英博物馆在线数据库^[2],因其题材多在萨珊波斯印章中较为典型,故不作单独讨论。以下仅就几件略为特别的印章稍作讨论,其他将于后文统一列表(见表1)。

在第二次中亚考察活动中,斯坦因于和田发现一枚石榴石质镶嵌宝石印章,录于《西域考古记(serindia)》图版V中Khot.004.a.^[3](图1.xi)。印面雕刻一人头牛身有翼怪兽,周边有帕列维文铭文。该形象常见于萨珊波斯印章中(如:大英博物馆藏编号O. A. 14,参看其在线数据库),学者多将其视为拜火教中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家畜之祖古帕夏(Gopatshah)^[4]。无论该观点是否正确,这一形象无疑源自两河流域传统的守护神兽拉玛苏(Lamassu)^[5],因此也可能有辟邪、守护的意味。印面周边帕列维文铭文由Barnett教授释读为“Apastan'al-yezdan”^[6],意为“寻庇护于神”,为萨珊波斯印章上常见的祝福语模式。

斯坦因发现于和田的另一枚石榴石质镶嵌宝石印章,录于其著作《西域考古记(serindia)》图版V中Khot.0088^[7](图1.xii)。印面雕刻一猴端坐吹笛,面前有一小猴举双臂舞蹈,甚有趣味。印面周边散布数个婆罗米文^[8]字母。猴戏流行于印度,而此类题材未见于萨珊波斯,但大猴的头部和全

[1] 斯坦因所获印章中的两枚(大英博物馆入藏号1907,1111.26和MAS.207,见表1)也由其赠予霍恩累以供研究。

[2] 相比斯坦因的著作,大英博物馆在线数据库中有更为清晰的藏品照片,故以后者为准,但对于斯坦因所获印章的出处仍以其著作为准。

[3]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MAS.209,可参看在线数据库。

[4] 萨珊晚期拜火教文献《本达希申》中称之为“原牛(gaw i ek-dad)”,是世间众家畜的祖先。

[5] 拉玛苏形象通常为人首牛身或人首狮身的神兽,长须、有翼,佩戴象征神力的角盔。两河流域自新亚述帝国(前911—前609)开始流行以巨型拉玛苏雕像守护宫殿和神庙。

[6] 参看大英博物馆在线数据库记录,此处为旧时帕列维文的注音规范,按较新的注音规范当为“'bst'n OL yzd'n”。

[7]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MAS.215,可参看在线数据库。

[8] 婆罗米文源自阿拉米文,是除佉卢文之外所有印度文字的祖先,书写方法上借鉴了佉卢文和希腊文。

身毛发均为萨珊波斯印章上描绘人物和兽类的常见手法^[1]。该类富有趣味的题材在希腊、罗马印章上更为常见，或许不关乎信仰，而仅为印章主人爱好、身份的体现。

在第一次中亚考察中，斯坦因于和田约特干发现一枚石榴石质镶嵌宝石印章，录于其著作《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图版XLIX中Kh.002^[2]（图1.xiii）。印面雕刻对狮，各以前肢扶于一头跪着的瘤牛背上。狮扑牛为萨珊波斯印章的常见题材，风格也较典型^[3]，但对狮组合却不常见，或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更为特别的是印面周边的铭文并非帕列维文，而更可能是巴克特里亚文^[4]。

斯坦因于约特干发现的另一枚石榴石质镶嵌宝石印章，录于其著作《西域考古记（*serindia*）》图版V中Yo.0099^[5]（图1.xiv）。印面雕刻一裸体女子手持长条织物甩过头顶，正与李贤墓所出镶嵌宝石印章上的人物为同一类，但体态更显丰满，两者内涵自当相近，但年代、产地或有不同。

除此之外，大英博物馆一件镶嵌宝石印章展出于中国区（图1.xv），材质和吕达墓、李希宗墓所出等外观一致，印面描绘一持花少女形象。该题材在萨珊印上较为常见（如：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19369，参看其在线数据库），前文论及李贤墓所出印章时已考证过该女子形象，可作参照。但该印出处不见于其在线数据库，亦未著录于斯坦因新疆考察报告中。此处且将其收录于表1，待进一步查证。

列表和讨论

以下列出所有20世纪至今国内出土可查询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的来源、年代^[6]、材质^[7]、题材、铭文、形制^[8]。为了方便讨论，对于所列萨珊印章较为丰富的题材作了一定程度的归类，其中将最为常见的单个动物题材分为猛兽（狮、虎、熊等）、食草兽（鹿、羊、牛）、啮齿兽（鼠、兔等）、蝎子、猴子、鸟六类，人物仅分立像和坐像。

[1] 大猴头部与上文李希宗墓、吕达墓所出印章上人物头部风格颇为接近，而表现身体毛发所用的短刻线亦可见于一些萨珊印章上的熊或鹰等多毛兽。

[2]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907,1111.26，可参看在线数据库。

[3] 类似风格的狮子可见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19767，瘤牛可见编号119868，参看在线数据库。

[4] 巴克特里亚地区古代流行的一种语言，属于中古伊朗语，其书写方法发展自希腊文，多见于1—3世纪各类贵霜王朝（包括作为萨珊波斯属国的时期）铭文中，此后在中亚和南亚的铭文中间或沿用，如5世纪后入侵印度的“艾肯匈奴（*Alchon Hun*或*Huna*）”即在其钱币上使用巴克特里亚语铭文。

[5]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MAS.170，可参看在线数据库。

[6] 此处国内出土记录按相关的断代数据，而大英博物馆藏品则参考了其在线数据库的断代，但其中一些在没有考古地层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断代信息并不一定可靠。

[7] 大英博物馆藏品参考其在线数据库给出的材质信息，但这批印章很可能没有经过科学材质检测，故此信息不一定可靠。

[8] 进一步讨论考虑，将给出较为详细的形制信息，包括镶嵌宝石印章的印面形状、凸面或平面，以及尺寸（部分大英博物馆藏品尺寸不详，但根据在线数据库中的标尺可判断其长度在1cm上下）等。

表1 20世纪至今国内出土可查询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

来源	年代	材质	题材	铭文	形制
河南洛阳市吉利区 吕达墓, 图1.i	北魏	蓝色宝石(表面有白色层)	人物立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 戒指整体直径21mm, 高22mm
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 图1.ii	北周	蓝色宝石(表面有白色层)	人物立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 戒指最大外径24mm, 内径17.5mm, 宝石直径8mm
山西太原徐显秀夫妇合葬墓, 图1.iii	北齐	蓝色宝石(表面有白色层)	人物立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 (戒指)最大外径28.9mm
河北赞皇县李希宗夫妇合葬墓, 图1.iv	东魏北齐	蓝色宝石(表面有白色层)	猛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 尺寸不详
内蒙古呼和浩特水磨沟口墓葬, 图1.v	北朝	蓝色宝石(表面有白色层)	翼人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 尺寸不详
陕西省西安市玉祥门外李静训墓, 图1.vi	隋	蓝色玛瑙	食草兽	无	半球形印章, 尺寸不详
宁夏固原史诃耽墓, 图1.vii	唐初	蓝色宝石(表面有白色层)	猛兽	帕列维文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 直径16mm, 厚5mm
河南偃师杏园YD1902墓, 图1.viii	盛唐	石榴石(或紫水晶)	铭文	帕列维文	镶嵌宝石印章(水滴形平面), (戒指)最大外径22mm
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 图1.ix	不详	白色玉髓	翼人	无	半椭圆形印章, 高22mm, 长25mm, 宽15mm
塔里木盆地(采集), 图1.x	不详	不详	鸟	无	半椭圆形印章, 尺寸不详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53), 图1.xvi	不详	蓝白缟玛瑙(nicolo)	猛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 长10.2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52), 图1.xvii	不详	蓝白缟玛瑙(nicolo)	食草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37), 图1.xviii	不详	石榴石	猛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菱形平面), 长10.2mm

(续表)

来源	年代	材质	题材	铭文	形制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36),图1.xix	不详	石榴石	啮齿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长7.6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35),图1.xx	不详	石榴石	族徽 ^[1]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长10.2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10),图2.i	不详	白色玉髓	啮齿兽	无	半椭球形印章,尺寸不详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549),获自约特干,图2.ii	一至四世纪	石榴石	啮齿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尺寸不详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546),获自约特干,图2.iii	一至四世纪	青金石	蝎子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尺寸不详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544),获自博拉赞,图2.iv	一至四世纪	红玉髓	多个头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尺寸不详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543),获自约特干,图2.v	一至四世纪	蓝白缟玛瑙(nicolo)	人物立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透镜形平面),尺寸不详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67),图2.vi	不详	玻璃	食草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长12.7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66),图2.vii	不详	青金石	男性胸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长10.2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34),图2.viii	不详	石榴石	猛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长10.2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547),获自约特干,图2.ix	一至四世纪	白水晶	食草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尺寸不详

[1] 族徽(Tamgha)或源于早期欧亚草原文化,为部落成员彼此辨识的徽记,在盟会时也用作象征部落的印记。萨珊波斯的族徽一般由帕列维文字母、象征天体的符号、绶带、翅膀等元素构成,仍用于标识持有者所在家族。

(续表)

来源	年代	材质	题材	铭文	形制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12), 获自塔克拉玛干, 图2.x	不详	褐色玉髓	兽头	无	半椭圆形印章, 长25.4c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2,1220.111), 图2.xi	三至七世纪	白色玉髓	蝎子	无	半椭圆形印章, 长20mm, 宽20mm, 高18mm
霍恩累收藏(大英1907,1111.26), 斯坦因《古代和田》, Kh.002, 获自和田, 图1.xiii	不详	石榴石	多体动物	巴克特里亚文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 长22.9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078(大英MAS.212), 获自和田, 图2.xii	不详	石榴石	多体动物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 长15.2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088(大英MAS.215), 获自和田, 图1.xii	不详	石榴石	猴子	婆罗米文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凸面), 长12.7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4.j(大英MAS.206), 获自和田, 图2.xiii	不详	石榴石	人物坐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 长11.6mm ^[1]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094(大英MAS.220), 获自和田, 图2.xiv	不详	红玉髓	食草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 长11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093(大英MAS.219), 获自和田, 图2.xv	三至六世纪	石榴石	异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凸面), 长12.7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085(大英MAS.214), 获自和田, 图2.xvi	三至六世纪	缟玛瑙	族徽	无	镶嵌宝石印章(圆形平面), 高8mm, 宽9mm

[1] 大英博物馆在线数据库作10.16cm, 或多打了个零。

(续表)

来源	年代	材质	题材	铭文	形制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04.a(大英MAS.209),获自和田,图1.xi	四至六世纪	石榴石	异兽	帕列维文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长12.7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Yo.0099(大英MAS.170),获自约特干,图1.xiv	二至三世纪	石榴石	人物立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高14mm,宽11mm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Khot.04.k(大英MAS.207),获自约特干,图2.xvii	三至六世纪	青金石	蝎子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宽8mm
大英博物馆收藏(详细出处不明),图1.xv	不详	蓝白缟玛瑙(nicolo)	人物立像	无	镶嵌宝石印章(椭圆形平面),尺寸不详

以上共统计20世纪初至今国内出土萨珊风格印章37件,其中国内考古报告所出10件,流至海外27件。按形制统计,则镶嵌宝石印章共31件,占83.8%,余下6件为整体雕刻的平面印(16.2%)。若按新疆和中原的地望来统计,则中原所出共8件(21.6%),新疆所出共29件(78.4%)。其中,中原所出除李静训墓外皆为镶嵌宝石印章,而新疆所出镶嵌宝石印章的比例也达到79%。对比萨珊波斯帝国境内一些遗址发掘的情况^[1]以及封泥证据来看,整体雕刻的平面印占比通常高于镶嵌宝石印章或两者相当,且更多作为实用器物。这暗示萨珊波斯风格印章在古代中国的引入和使用有着不同于源头的西亚地区的模式。例如,中原出土8枚镶嵌宝石印章中有6枚出自高等级墓葬,暗示其为贵族王侯方能享有的“舶来”品、奢侈品,继而可作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却无作为实用印章的证据。

萨珊波斯官方用印通常带铭文,铭文中细数用印者官职和辖区。反观国内所出仅有两枚带帕列维文铭文,且均为祝福/祈愿之意,未见和官僚系统的任何关联。此亦可说明萨珊风格印不属于当时中国官方的用印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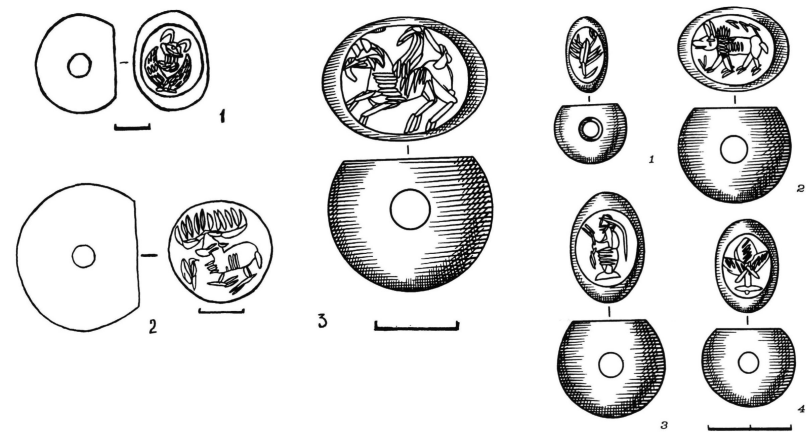


图10

[1] 参看Göbl 1976和Richard 1973。

中亚亦曾一度流行萨珊风格印，对比其出土资料或可提供进一步线索。如讹答刺（Otrar）绿洲地区的数个墓葬中出土过一批萨珊半椭圆形印章（图10），但并无用于封泥的证据。整体雕刻的平面印在萨珊波斯境内多作实用器，而此地的出土情况却暗示其主要功能或为装饰佩戴，尤其konyrtobe的65号墓葬一次出土四枚印章且和其他珠饰一起串系佩于墓主身上^[1]，其使用方式一目了然。这些印章的图像风格与新疆所出的几件半椭圆形印章一致（图1.ix—x, 2.i, x—xi），很可能为波斯本土所产（关于风格参看下文）。林梅村先生以讹答刺为康居两王庭之一的“恭御城”。康居汉时为中亚最强的游牧王国，匈奴内乱时（前60年左右）郅支单于亦曾奔之。4世纪后康居渐衰，终为另一个游牧王国嚙哒所并，而konyrtobe很可能是4—5世纪盘踞此处的游牧人的墓地，半宝石材质的印章兼有当时流行的波斯雕刻工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也可以体现佩戴者的身份。讹答刺并无封泥出土，但亦不排除这些印章曾在周边的粟特城市（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中使用，然实用功能终究是其次的且缺少确实的证据。

另一方面，在粟特人的城市如撒马尔罕附近的卡费尔·卡拉（参看徐显秀墓考证部分），以及更南方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和犍陀罗地区则多见带萨珊波斯风格印蜕的封泥。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亦同时发现过萨珊风格的整体雕刻平面印和宝石镶嵌印，但后者明显居多，恰和新疆的情况相近，封泥证据则显示宝石镶嵌印为主要的实用印章^[2]。这些封泥和印章的实物证据可见于Aman ur Rahman的收藏、塔克西拉和白沙瓦博物馆的收藏^[3]，以及上文提到的卡费尔·卡拉的出土报告。这些地区对于宝石镶嵌印的偏

爱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贵霜时期的传统。不过这些地区印章风格较为多样，萨珊风格只占一部分，其他如更早期的“贵霜—萨珊”（Kushano-Sassanian）风格、略晚的“匈人”^[4]风格和“印度化”风格等也很流行（关于风格参看下文的讨论），其中一些甚至可能反向影响了同时期的萨珊波斯印章艺术，这也反映出中亚地区人口流动和政权更替的频繁^[5]。一些萨珊波斯风格印章和印蜕上可见巴克特里亚文或婆罗米文铭文（图11），证明其部分是在当地制作的，前文亦已述及斯坦因发现的类似例子（图1.vii—viii）。

中国境内萨珊波斯风格印章的主要出土地无疑是新疆的塔里木地区，在此也可观察到同巴克特



图11

[1] 参看Smagulov 1997，第254—255页。

[2] 宝石镶嵌印通常镶于贵金属戒托中，于封泥上钤印后，印蜕外侧会有一圈高起的平面。很多戒托一侧更有凸起圆球（一般认为用于定位，或是将戒指从黏土中拔起的杠杆），在封泥上也会留下一个独立凹点。由此可以和整体雕刻的平面印的印蜕区分。

[3] 关于Rahman的收藏可参看其两份图录，即Lerner & Sims-Williams 2001以及Rahman & Falk 2011，后者的附录中也收录了两个博物馆所收藏的印章。

[4] 此处所谓“匈人”，指4世纪后入侵中亚和南亚的游牧部落，古籍中也有称“红匈奴”（寄多罗）、“白匈奴”（嚙哒）、“艾肯匈奴”（入侵南亚的一支游牧部落，族属不明）等，西方称Hun或Huna、Chionite等，然与汉时强盛于中国北方的匈奴并非同族，故此处统一称为“匈人”以免混淆。

[5] 笔者所见和田地区（主要为尼雅）出土的木简封泥上亦未见萨珊波斯风格印蜕，反而是“贵霜—萨珊”风格和“匈人”风格更为多见。

里亚和犍陀罗地区相似的多样性，而主要的区别在于萨珊风格印的封泥证据至今未见出土。塔里木地区早期主要的用印证据来自尼雅の木简封泥，但其年代偏早，亦未见萨珊波斯风格印蜕。汉代起塔里木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多见汉印或仿汉印^[1]，或在实用层面进一步削弱了萨珊风格印的功能。因此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无论是整体雕刻的平面印还是宝石镶嵌印，萨珊风格印章在新疆的主要功能当为装饰，或兼以标识佩戴者的财富地位，作为文书、货物封缄的实用性可能存在但缺乏有力的证据。

印章的雕刻风格是一个烦冗枯燥的问题，和年代以及作坊的位置都有关系。这项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于萨珊波斯印章本身至今也没有很权威的风格分类标准，兼之篇幅所限，此处只能择其要者略作讨论。

本文将表1中所有发现于新疆的半椭球形印章都归于“I类风格”，其特征是躯干以少数粗线条勾勒，其他身体细节和四肢均以细长直线描绘。这些半椭球形印章显然和诃答刺所出风格一致，后者年代在4—5世纪，俄国学者已有论证^[2]，推测是在萨珊波斯帝国的中心制作，并由粟特工匠贩运到中亚。宝石镶嵌印中也有一些可归入此子风格，如图1.xiii、xix，图2.iii、vii、xvii等。

另一类较为近似的风格，但使用的线条相对较短，人物体态敦实并显庄重，且躯干多呈“哑铃”形状。典型的例子如史河耽墓所出印章上的狮子，李静训墓所出印章上的鹿，以及图1.xi、xv、xvi，图2.xii、xiii、xv等。这类风格实例较多，或许还可以细分，比如有一些动物的身躯简化为两个相连的椭圆，此处暂不做深入而将其统称为“II类风格”。值得注意的图1.xii的吹笛猴虽然躯干没有上述特征，但按照雕刻手法来看也可以归入此类。

就中原出土的实例来看，II类风格的年代当较I类晚。Bivar将大英博物馆所藏几件类似的狮纹印断在5世纪^[3]，但在一些存世的萨珊封泥上也可以找到类似雕刻手法的狮子、羊等。考虑到这些萨珊封泥的年代^[4]，或可保守估计此类风格年代在5—6世纪^[5]。



图12

和此类较为饱满庄重的表现手法相比，中原北朝时期出土的宝石镶嵌印上人物体形较瘦，姿态更为灵动，但同时身体细节描绘往往不细致。此处称其为“III类风格”。新疆所出的一些动物题材印章亦可归于此类，如图1.xii，图2.v、vi、xiv等，其中几件甚至大有“简笔画”之意。这般手法让人联想起罗马帝国晚期以及贵霜晚期的一些宝石雕刻作品。在尼雅也曾发现一枚宝石雕刻印章（图12），上刻“简笔画”风格人物，其倚柱而立的姿态则常见于罗马钱币及印章，类似题材在塔克西

[1] 如Stein 1921, N.XXIV.viii.74（图版XX）；Stein 1907, N.vx.67（图版LXXII）。

[2] 参看Smagulov 1997，第258页；Levina & Nikitin 1991，第65页。

[3] 参看Bivar 1969, DA7, DH1等。由于可作对照的考古出土资料匮乏，Bivar主要参考的还是铭文书法和宝石材料及形制的流行时段，但这两个标尺的精确性仍值得怀疑。

[4] 在Gyselen 2007中可找到不少例子〔如III/47(1), III/48, III/57等〕，Gyselen认为这些存世封泥的年代，多在库思老一世继位后，其中一些可晚至后萨珊时期（7—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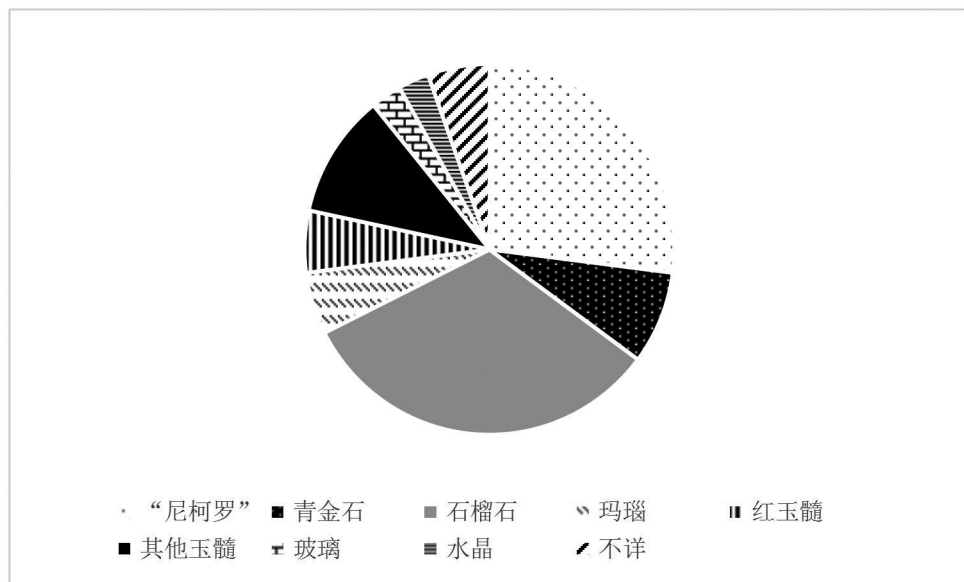
[5] 另一经验性判据是，此类蓝底白色材质且印面平坦的宝石镶嵌印在6世纪以后已不再流行，参看Bivar 1969，第23—24页。

拉也有出土^[1]，是贵霜时期较为常见的一类风格。前文也对人物身体姿态上的相似性有所论述，由此可见Ⅲ类风格很可能是基于贵霜—萨珊风格演化出的一类更为“萨珊化”的风格。萨珊波斯帝国控制贵霜北部主要在3—4世纪，此后寄多罗（Kidarite）、嚙哒（Hephthalite）等“匈人”部落陆续侵入，5世纪晚期嚙哒入侵笈多王朝后，印度文化迅速渗入中亚，印章风格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印度化”，由此或可推断Ⅲ类风格的大致年代在3世纪至5世纪早期。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出土Ⅲ类风格印章的墓葬几乎都在6世纪，比上述估算的年代晚了至少百年。这暗示着这些宝石镶嵌印（或许不包括其金属镶嵌）在入葬前已有长期传世，或在丝路商人手中，或在中原王朝统治阶层手中^[2]，这会让印章纹饰内涵的考证变得更为艰难——需要考虑的可能性变得更多，比如某位丝路商人将这些印章朝贡给了一位皇帝，此后再通过赏赐、聘礼、外交、军事掠夺等方式流入最后的拥有者手中。实际上史诃耽墓出土的Ⅱ类风格印章也比其墓葬年代早了近百年，不过这可以家族传承来解释（因此阿什女神信仰一说仍然成立）。中原地区唯一雕刻风格和墓葬年代较为符合的是河南偃师杏园所出的文字宝石镶嵌印。

最后略论这批印章的材质。其中最具争议的自然是那些蓝色基底白色顶层的宝石，它们在中原很受欢迎，新疆也有发现。大英博物馆将新疆出土的此类材质均标注为“尼柯罗”，具体上文已有考证，但始终缺乏科学检测依据，而史诃耽墓和徐显秀墓检测结果甚至出现了矛盾。无论如何，这些印章外观相似显而易见，当可确认为同一材质，故此更为细致的科学检测当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同时亦可考虑和此类材质印章主要流行地的检测数据对比，以及是否人为改色的实验性分析。

以下为各类材料的占比统计，上述蓝色基底白色顶层的宝石在表中称为“尼柯罗”——



这批印章最为流行的材质是石榴石（32.4%）和“尼柯罗”（27%），若按矿物类型统计，则石英质矿物占比最高（54%）。这一结果基本和西亚、中亚的情况接近，但较为特殊的现象包括红

[1] 参看《塔克西拉》第三卷，第197页。

[2] 另一种解释，即某个Ⅲ类风格的作坊将该风格维持到了6世纪，看来可能性不大，除非这个作坊处于半孤立的状态，比如在中原地区。

玉髓材质的相对稀少，以及“尼柯罗”的高比例（在中原地区尤甚），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使用人群（尤其是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的审美偏好。“尼柯罗”在地中海至中亚曾风靡一时，罗马人认为其矿物原料来自两河流域或波斯湾地区^[1]，产量较为稀少。蓝白两色组合较青金石更具特色，即使陶瓷玻璃亦难模仿，由此招致贵族们的追捧。

另一类常见的材料是石榴石。这些宝石的颜色多呈深邃的暗红色，可能为铁铝榴石，产地或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地区使用石榴石质宝石镶嵌印的历史可追溯到贵霜时代^[2]。不仅是宝石镶嵌印，上文提到的讹答刺绿洲也出土过镶嵌大型素面石榴石的饰品^[3]，新疆的波马金器窖藏也以石榴石为主要镶嵌物^[4]。显然对石榴石的偏好流行于西域，相比之下红玉髓可能因为色泽不够浓厚深邃，反而少见於高等级首饰镶嵌中。

总 结

本文对20世纪初至今中国境内出土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按来源和出土地罗列并主要对见诸国内考古报告部分的出土情况、年代、形制、纹饰等略作考证，此后又结合西亚和中亚的相关资料，对其功能、风格、产地和材料等进行了讨论。有结论如下：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萨珊波斯风格印章主要形制为宝石镶嵌印，并有少量整体雕刻的平面印（半椭球形为主），可考证最早的出土记录在6世纪初，但半椭球形印章的年代可早至4世纪，最晚的出土记录在盛唐（8世纪）。

二、两种形制的功能可能都以装饰佩戴为主，兼而体现佩戴者的地位、财富，而作为货物文书封缄的实用功能则在次，尚无足够证据表明这些印章有徽章、令牌之类身份验证的功能。

三、本文所讨论的印章根据雕刻风格可细分出三类（不涵盖所有样本），年代和产地各有不同，其中Ⅲ类可能在中亚甚或当地制作，而Ⅰ、Ⅱ类则可能来自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作坊。

四、中原地区所出萨珊风格印当为舶来品，其中Ⅲ类居多并全部出自北朝墓葬。

五、中原地区Ⅱ、Ⅲ类萨珊波斯风格印章的入葬年代均比该风格可能的流行时段晚至少上百年，其流入机制有待进一步考证。

六、中国境内萨珊风格印材料的主要流行情况和中、西亚相仿，而“尼柯罗”在中原地区更受追捧，其原因尚需进一步探究。

总的来看，中国境内，尤其是中原地区出现的萨珊风格印多采用流行度较高的“吉祥”题材，其中一些或许能体现使用者的社会身份，而少见和宗教信仰严格挂钩的题材。可见这些印章多以迎合境内居民的审美意趣或对“舶来品”的兴趣为动机流入中国，只有少数印章和使用者的信仰可能有更深的联系。本文仅以萨珊波斯印章作为一个切入点，展现域外印章在古代中国的流行情况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因篇幅所限，很多问题尚无法讨论得非常深入，欢迎方家指点。

[1] 这两个地区并非玉髓类矿物的主要产区，可能只是中间商。

[2] 关于中亚早期的石榴石宝石雕刻印参看Adams 2012。

[3] 参看BAYPAKOV等 2005，第127页，彩图3.13，该地也出土过红玉髓的珠子。

[4] 参看《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

参考文献:

- 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
- 常一民:《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第4—21页。
- 盖山林、陆思贤:《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2—185页,图版捌。
- 葛崤(Genito, Bruno)、齐东方:《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2017年。
- 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 郭物:《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第96—101页。
- 胡淼:《中国境内出土的西方金银器与金银币初探》,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
-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线装书局2009年版。
- 乐仲迪(Lerner, Judith A.):《萨珊印章上的希腊鸟身女仙》,《丝路艺术》2017年春季卷,第135—143页。
- 李晋柱、李新铭、何健武,等:《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382—390页。
- 李锦绣:《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2011年。
- 罗丰:《李贤夫妇墓志考略》,《美术研究》1985年第4期,第59—61页。
-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9期,第44—57页,图版拾至拾陆。
- 施安昌:《北齐徐显秀、娄上观墓中的火坛和礼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第41—48页。
-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第471—472页,图版贰、叁。
- 武光文:《北齐徐显秀墓》,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
- 熊存瑞:《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镯的产地问题》,《文物》1987年第10期,第79—81页。
- 徐殿魁:《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
- 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张鹏:《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42—45、50页。
- 张庆捷、常一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文物》2003年第10期,第53—57页。
- 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1988—1997年度民丰县尼雅遗址考古调查简报》,《新疆文物》2014年3—4季度合刊。
- Abdullaev K.: "Ancient Subjects in the Early Medieval Age Glyptics of Sogdia after bullaes of Kafirkala in Environs of Samarkand", Material on the Ancient Culture of Uzbekistan, 2005, pp.25—32.
- Adams N.: "The Garnet Millennium: the Role of Seal Stones in Garnet Studies", 'Gems of Heaven': Recent Research on Engraved Gemstones in Late Antiquity, c. AD 200—600, The British Museum, 2012, pp.10—24.
- Baypakov K.M., Smagulov E. A., Erzhigitova A. A.: "Early Medieval Burial Sites Of South Kazakhstan",

Almaty, 2005.

Bivar A. D. H.: *Catalog of the West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Stamp Seals, II: The Sassanian Dynasty*, London, 1969.

Callieri Pierfrancesco: *Seals and Sealings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Afghanistan*, 1997.

Cereti C., Cazzoli S.: “The Sealings from Kafir Kala: Preliminary Report”,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1(1–2), 2005, pp.133–164.

Compareti Matteo: “Two Seal Impressions from Kāfer Qal a (Samarkand) an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ranian Divinities.”, *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 6.1–2, 2013, pp.127–142.

Gignoux P.: *Catalogue des Sceaux, Camees et Bulles Sasanide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et du Musee du Louvre II. Les Sceaux et Bulles Inscrits*, Paris, 1978.

Gignoux P., Gyselen R.: *Bulles et Sceaux Sassanides de Diverses Collections*, Paris, 1987.

Gnoli Gherardo: “A Sassanian Iconography of the Dēn”, 1993, CAIS.

Gnoli Gherardo: “Farr(ah)/xwarenah”,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9, 1999, pp.312–319.

Göbl R.: *Die Tonbullen von Tacht-e Suleiman. Ein Beitrag zur Spät-Sasanidischen Sphragistik*, Berlin, 1976.

Grenet Frantz: “Iranian Gods in Hindu Garb: The Zoroastrian Pantheon of the Bactrians and Sogdians, Second–Eigh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010, pp.87–99.

Gyselen R.: *Sassanian Seals and Sealings in the A. Saeedi Collection*, 2007.

Huyse Philip: “Die Dreisprachige Inschrift Šābuhrs I. an Der Ka'ba-i Zardušt(SKZ)”, Vol. 3(1),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London, 1999.

King C. W.: *Antique Gems. Their Origin, Uses, and Value as Interpreters of Ancient History and as Illustrative of Ancient Art with Hints to Gem Collectors*, London, 1866.

Lerner J. A., Sims-Williams N.: *Seals, Sealings and Token from Bactria to Gandhara, 4th to 8th Century CE*, Vienna, 2011.

Levina L. M., Nikitin A.B.: “Ob odnoj gruppe iranskih reznyh kamnej iz vosto nogo Priaral'ja”, *Vestnik Drevnej Istorii*, 1991, pp.53–65.

Marshak B. I.: *Silbersch tze des Orients*, Leipzig, 1986.

Marshak B. I.: *History of Oriental Toreutics of the 3rd–13th Centuries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Continuity*, St. Petersburg, 2017.

Miri N.: “Representation of Children in Sasanian Rock Reliefs”, *Intl. J. Humanities*, 2017.3, pp.67–80.

Mode M.: “Sogdian Gods in Exile–Some Iconographic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Material Excavated in Sogdian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 1991, pp.179–214.

Rahma A., Falk H., *Seals, Sealings and Token from Gandhara*, Wiesbaden, 2011.

Richard N. F.: *Sasanian Remains from Qasr-i Abu Nasr. Seals, Sealings, and Coi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Shenkar M.A.: “ОБ ИКОНОГРАФИИ ХАРАНАН И ЕГО РОЛИ В ИДЕОЛОГИИ ДРЕВНИХ ИРАНЦЕВ”, The Last Encyclopedist: The Issue in Honor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Boris Litvinsky, Moscow, 2013, pp.427–452.

Smagulov E.A.: “Finds Of Sasanian Gems In The Otrar Oasi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3.2–3, 1997, pp.253–259.

Soudavar Abolala: “FARR(AH) ii. Iconography OF FARR(AH)/XWARENAH”, Encyclop dia Iranica, Online, 2016.

Stein M. A.: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by Marc Aurel Ste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2 vols.

Stein M. A.: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5 vols.

图版说明:

图1中国境内出土萨珊波斯风格印章: i. 吕公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图版拾叁.3; ii. 李贤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丝绸之路》220页; iii. 徐显秀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北齐徐显秀墓》彩图版; iv. 李希宗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v. 内蒙古水磨沟口北朝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图版捌.5; vi. 李静训墓所出嵌珍珠宝石项链上的半球形印; vii. 史诃耽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异宝西来》198页图39; viii. 偃师杏园唐墓所出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图版叁.2, 图二; ix. 巴楚脱库孜萨来所出宝石镶嵌印; x. 塔里木所出半椭圆形印章, 图片采自《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版壹壹.49; xi.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MAS.209; xii.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MAS.215; xiii.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907,1111.26; xiv. 大英博物馆藏编号MAS.170; xv. 大英博物馆藏宝石镶嵌印。

图2大英博物馆藏新疆出土萨珊波斯风格印章: i. 编号1902,1220.110; ii. 编号1902,1220.549; iii. 编号1902,1220.546; iv. 编号1902,1220.544; v. 编号1902,1220.543; vi. 编号1902,1220.167; vii. 编号1902,1220.166; viii. 编号1902,1220.134; ix. 编号1902,1220.547; x. 编号1902,1220.112; xi. 编号1902,1220.111; xii. 编号MAS.212; xiii. 编号MAS.206; xiv. 编号MAS.220; xv. 编号MAS.219; xvi. 编号MAS.214; xvii. 编号MAS.207。

图3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编号1972.1317.86, 图片采自其在线数据库。

图4i.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19611, 图片采自其在线数据库; ii. 纳克西·鲁斯塔姆的阿达希尔一世摩崖石刻; iii.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19352。

图5i. 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金镶绿松石项圈 (См.1727–1/61), 图片采自其在线数据库; ii. 撒马尔罕卡费尔·卡拉遗址出土封泥, 图片采自Compareti 2013, 图11; iii. Rahman收藏Inv#GKc 231 (封泥), 图片采自Rahman & Falk 2011, 75页; iv. Rahman收藏Inv#GKg 005, 图片采自Rahman & Falk 2011, 103页; v. 印度一斯基泰时期阿泽斯 (Azes) 钱币背面的宙斯像, 图片采自“The Virtual Museum of Indian Coins” (<http://coinindia.com>); vi. 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花刺子模银器, 图片采自

Marshak 1986, 图169。

图6i.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编号1975.7.14, 图片采自Gignoux 1978, 图版XX; ii. 虎纹银盘(出土地不明), 图片采自Marshak 2017, 图51。

图7比沙普尔Tang-e Chowgan的沙普尔一世摩崖石刻, 图片采自Miri 2017, 图6。

图8阿什莫尔博物馆藏萨珊波斯印章, 图片采自Gignoux & Gyselen 1987, 图版VIII, 30.32。

图9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编号130994, 图片采自其在线数据库。

图10讹答刺绿洲出土萨珊波斯风格印章, 图片采自Smagulov 1997, 图1—2。

图11带巴克特里亚文铭文的萨珊波斯风格印蜕, 据说来自巴尔赫(Balkh), 图片采自Lerner&Sims-Williams 2011, 100页(AB1.1)。

图12尼雅遗址出土宝石镶嵌印, 图片采自《新疆文物》2014年3—4月合刊封底。

(作者系自由职业者)